

新时代中国对美政策：回顾、评估与建议^[1]

王 帆

【内容提要】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过数次战略调整与重大起伏，中国的对美政策出现了阶段性侧重点的不断调整，从“求合作、促发展”到“促合作、谋共赢”，再到“平等互利、总体稳定”，中国在发展对美关系上已然积累了诸多丰富经验，保持了较强的连贯性、原则性、灵活性、主动性、务实性等特点，并坚持合作与斗争两手抓。面对美国政府不断强化对华竞争和遏制，以及“脱钩断链”等倒行逆施，新时代发展对美关系要注重加强战略统筹，增强战略主动，综合施策，积极稳妥作为。未来，中国还应加强对美政策预判，放弃幻想，坚持中美关系管控的基本原则，强化中美交流的体制机制建设。并立足于建强自身，做深做透美国国内民众的工作，努力营造竞争中的合作氛围，以创新思维探索中美大国相处之道。

【关键词】新时代 中美关系 对美政策 战略竞争 美国大选 旧金山愿景

【作者简介】王帆，外交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4) 04-0001-23

[1] 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政策方针事关中国外交全局，但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对美政策的系统思考仍有不足，大部分的观点都穿插于“中美关系”“中美竞争”以及“中国对外战略”等主题或其他具体领域的研究之中，对总体对美政策的全面回顾和系统评估较少。而中美建交45年来，两国关系经历过数次战略调整与重大起伏，这段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的对美政策脉络需要进行细致梳理和经验总结，并针对当前及未来中美关系新形势，综合施策，积极稳妥作为，力争保持两国关系总体稳定。

一、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概述

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实现了从“非敌非友”到“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再到竞争性共存的转变。经过45年的积淀，两国关系已有相当厚度和广度，双方利益交融十分紧密，但也面临各种干扰破坏和复杂严峻挑战，总体上是交流合作与分歧摩擦并存，在曲折中前行。

中美建交后的头10年，两国高层及各领域交往日益热络，特别是两军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1]20世纪90年代，中美确立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关系中的重大事件。1997年10月、1998年6月，江泽民主席与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实现互访，确定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定位；2009年11月，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访华，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举行会谈并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美，与奥巴马确立了“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2018年12月，习主席在与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强调，双

[1]《习总访美：基辛格为何说这是“历史转折点”？》，人民网，2015年9月2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5/c1001-27633242.html>。

方要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2021年11月、2022年11月和2023年11月，习主席在与拜登总统举行的3次会晤中都提出了未来中美关系的正确相处之道，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也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之道，其中首要原则是相互尊重。

中美建交45年来，两国政治关系从政府对政府逐渐转向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交流。2018年前双方曾建有100多个对话交流机制，开展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两国贸易额从建交时的24亿多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6644亿美元，增长了200多倍，现有双向投资存量也超过2600亿美元。^[1]目前在华美资企业超过7万家，其近90%的在华业务实现盈利。^[2]

同时，中美关系也经历过曲折动荡，1989年两国关系的急剧倒退、1995-1996年台海危机以及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都使得中美关系进入过一段低谷时期。21世纪的头10年，美国已开始不断加大防范中国崛起的力度；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发布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后对华实施极限打压；拜登政府则继续延续对华遏制战略的总基调。近年来，美国通过在各领域“去中国化”、大搞阵营对抗等方式加强对华遏制和围堵，严重背离“相互尊重”原则，导致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美政策回顾

（一）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对美政策方针：求合作、促发展

冷战结束之后，受意识形态、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

[1]《国务院新闻办就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举行发布会》，中国政府网，2024年1月27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1/content_6929006.htm。

[2]《新华时评：地球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推动中美关系回归正轨系列评论之四》，新华网，2023年11月12日，http://m.xinhuanet.com/2023-11/12/c_1129971362.htm。

中国的防范与遏制。但这一时期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党内及之间在对华认知上都存在分歧，美国并没有形成对华全面遏制的战略，而是奉行对华“遏制+接触”（Congagement）政策，一方面在经贸、裁军和防扩散等问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但另一方面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底线。例如，1994年美国调整对台湾政策框架，试图提高美台之间官方往来的层级以及台湾地区的所谓“国际地位”；1995年甚至允许台湾地区时任领导人李登辉访美，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障碍。此外，美国试图通过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以及利用人权问题对华制裁来刻意制造矛盾并用以牵制中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作为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分歧时，中国主张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和威胁制裁。1997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成功访美，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提出“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尽管该份声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交流合作并改善了两国关系，但中美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实质性消减，双边关系此后仍有所起伏。在该时期，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以改善两国关系为目的，强调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矛盾，核心要义在于维护中美关系大局。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1999年的炸馆事件，中方都选择了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为重。中国为进一步发展经济，积极加大吸引外资、引进外部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力度，推动克林顿政府改变将最惠国待遇作为要挟条件、以人权为由于涉中国内政的作法，从而根本性地解决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障碍问题，最终与美方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协议，使得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能够更上一个台阶。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对美国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挑衅行为做出有力回击，但总体上采取了以“求合作、促发展”为主线的对美政策方针。

（二）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对美政策方针：促合作、谋共赢

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曾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关系”，但“9·11”

事件发生后，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发生重大变化，小布什政府提出将反恐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需要中国在反恐问题上的支持与配合。在此背景下，中国及时调整对美政策目标，提出与美国建立和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在 2002—2012 年期间取得丰硕成果。仅在小布什任期内，两国领导人举行了 19 次会晤、30 次通话，美国领导人 4 次访华。除了高层的紧密互动，中美在具体实务领域也进行了紧密的合作。例如，在反恐领域，中国在地缘、情报等方面给予美方支持；在经贸金融领域，中国在 2008 年为协助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同时不仅没有“趁机抛售美国国库券”，而且大量增持美国国债；另外，2009 年中美两国在华盛顿首次开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由于中美两国在此阶段的紧密联系，国际舆论一度兴起“中美国”“G2”^[1]等概念。

2011 年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两国共同发表《中美联合声明》，主张“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该份联合声明不仅确认双方将继续“建设伙伴关系”，而且中美两国都对彼此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一定程度上的认可。美方在声明中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而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2]该声明还对中美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及在台湾、人权问题上开展对话达成一致。可以说，中美两国的关系不断深化，“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相比之前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不仅反映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

[1] “中美国”一词（Chimerica，又译为“中美共同体”“中美经济联合体”等）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史教授舒拉立克（Moritz Schularick）于 2007 年共同提出的新词，强调中美经济关系的紧密性以及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G2”（“中美两国集团”）最早是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所长伯格斯特（C. Fred Bergsten）于 2004 年提出，强调形成中美分享全球经济领导权的机制，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度得到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美战略界要人的推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声明》，2011 年 1 月 20 日，外交部网站，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1207_680540/201101/t20110120_9361624.shtml。

更多期待，也表明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了更为积极、具体的战略目标。

（三）新时代中国的对美政策方针：平等互利、总体稳定

中共十八大之后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但由于美国逐渐转向对华全面遏制战略，中美关系发展也进入了挑战明显增多、形势更趋复杂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实力相对衰弱的态势愈发明显，为维护其霸权地位，美国的两党政治精英已开始对两国关系做出重新评估，并对其全球战略进行调整与再部署。2012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在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尽管中国在经贸、气候变化、人文等领域仍与美国保持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但美国在战略层面明显加强了对华防范和遏制，一方面着力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并利用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联合并支持其他国家不断在南海挑衅滋事，破坏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积极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等排斥中国的经济战略举措。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首访美国，与奥巴马达成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2015年9月，习主席再次访美并提出“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强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具体建议，丰富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核心内涵可概括成“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尽管美国继续在南海等问题上严重侵害中国的利益，但是双方的分歧和摩擦仍处于可防可控的范围，双边关系总体上保持了平稳。

然而，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外战略重点由“反恐战争”转向“大国竞争”。之后美国又挑起对华贸易战，并在外交、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加大对华打压，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滑坡式下降，从此前某些领域的“不和”发展到近乎全

面“紧张”和局部“对抗”。拜登政府上台后，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地缘政治挑战”，推行所谓“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对华竞争战略，在亚太地区拼凑美英澳、美日韩、美日菲等各种针对中国的小多边安全机制，裹挟北约东进，制造阵营对抗；力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做法，强化对华经贸、科技打压；通过“切香肠”伎俩不断架空一个中国原则，持续加强美台“官方”实质关系，加力助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加紧美台军事勾连甚至不断威胁军事介入，在南海不断怂恿支持菲律宾挑衅侵权。总之，近年来美国阻挠中国统一和发展进步的战略企图日益露骨，导致中美关系持续下跌甚至逐渐滑入“敌对关系”或“新冷战”的趋向。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不愿接受中国的崛起和强大，特别是其因“和平演变”策略失败而呈现出歇斯底里式的遏华保霸心态。

在新时代，中国一方面保持对美的战略定力，延续“不对抗，求合作”的总体方针，并向美方提出“中国思路”“中国倡议”。另一方面，坚决反击美方的恶意挑衅和极限打压行径。中国不得不探索新思路：一是将对美政策纳入中国对外的整体战略之中，致力于“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1]，以对冲中美关系恶化的负面影响，例如保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效运作、推动金砖国家之间高水平合作等；积极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加强“全球南方”的团结协作，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二是在相关领域积极主动采取一系列应对举措。在经贸领域，为防止中美“经济脱钩”以及全球产业链受美国的干扰破坏而发生偏转，提出利用自身市场规模的优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同时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互利共赢；在科技领域，为应对美西方对中国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挑战，提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的综合国力优势”的要求。三是随着近些年来美国

[1]《服务民族复兴 促进人类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开展》，新华网，2022年9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2-09/25/c_1129031106.htm。

对华遏制力度的加大和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不主动放弃合作、尽最大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更加坚定、自信地维护自身的各项合理利益，不断展现出“不惧对抗，敢于斗争”的姿态。总之，新时代特别是2017年以来中国倾向于采取“以良性互动促稳定”与“以斗争求合作”并举的总体对美政策方针，并努力加强“对美之外”的外交以平衡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围堵”。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美方也日益意识到保持中美关系不失控、防止两国走向冲突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尽管中美之间存在严重对立，双方依然保持积极沟通。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2022年11月，两国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晤；2023年11月，习主席与拜登在美国旧金山再次会晤，双方达成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为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落实“旧金山愿景”已成为双方互动的核心议题，中美之间举行了多次高级别沟通与对话，显示双方在管理复杂关系时认识到沟通交流与积极互动的必要性，两国关系总体上也呈现出止跌企稳的态势。

三、经验总结

40多年来，中国发展对美关系有一个贯彻始终的目标——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基础上不断加强与美国的交往与务实合作，以此为重要抓手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以中美合作作为稳定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的主线。另一方面，针对美国的遏制与打压，中国坚持原则底线，以斗促合、斗而不破；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和困境时，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并积极主动推动转圜。总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美国对华政策如何调整，中国正是由于坚持了一以贯之的大局为重、理性务实、积极灵活的对美政策方针，才始终维持了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

一是**连贯性、原则性强**。这主要体现在坚持合作与斗争两手抓，以斗争促合作，以合作促互利，坚持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从提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建设性合作关系”，再到“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始终从对历史和世界负责的战略高度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并主张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美方不能踩踏中方的红线。^[1] 尽管近年来美国转向加大对华遏制，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中方不仅批驳美方错误行径，强调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更是以最大诚意、最大实际行动推动两国合作。无论是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还是旧金山会晤，以及两国一系列双边高层会晤，中方都不断强调中美合作互利的重要意义，持续表达与美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推进大国协调合作、和睦相处的意愿，不断向美方释放积极信号，主动引导两国进行合作。尽管美方并未积极响应中方的善意，但中方仍然积极致力于保持两国基本的合作关系，维护两国关系的整体稳定。同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中方也始终坚持原则、绝不退让，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面对美国不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践踏中国红线底线的错误言行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中方始终认为，合作不是以退让为代价，斗争的目的也不是逞强斗狠，而是要让美国意识到绝不能触及中国的红线底线，知戒知止。

二是**灵活性、主动性**强。中国在对美政策上采取灵活态度，能够根据外部战略环境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及时应对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带来的外部挑战。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和韬光养晦之策，强调以维护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为重，促进中美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21世纪初，中方就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人类共同威胁与美方达成共识，并在2008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时与美方加强合作，引导两国关系持续前行。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遏制打压，特别是企图通过“塑造中国的战略环

[1] 参见《王毅谈中方对中美关系的“三个一以贯之”》，新华网，2024年4月2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0426/ef69082966db4b18a98d32f60ca4fb19/c.html>。

境”由外而内遏压中国。中国在最大限度寻求对美有原则合作的基础上，因势而变进行战略调整，力求以合作化对抗、以斗争求合作。

中国在外交上积极进取，在全球议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提出的三大倡议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动荡不定的世界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外交领域的各项工作因此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美国对华心态和政策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不得不“在打压中国和对华保持沟通的矛盾中保持微妙的平衡”。^[1]可以说，当前中美关系的止跌回稳，离不开中方的主动作为。虽然中美关系存在不对称性和中方一定程度被动反应的情况，但在维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方面中国一直发挥着主动作为的作用。中国坚持推动中美从战略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并致力于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例如，共同的经济利益长期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虽然“压舱石”当前的作用比之从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维系中美有限合作的重要支撑。两国企业合作的基本盘仍在。中美军事交流的恢复与推进也成为近期两国关系发展的新亮点。中国还主动在中美关系中倡导“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历史经验表明，误解对方战略意图会对两国关系造成深远的不良影响，而过去40多年中美之间不断深化的各层次对话，加深了彼此对对方战略意图的了解。

三是务实性、统筹性强。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务实的，双方在合作中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两国在经济领域长期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可以形成增益效应。例如，中国的轻工业品与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相互补充，美国在一些问题上有求于中国的时候，两国关系往往会得到发展。中美关系是共赢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两国关系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则可推动中美关系前行。

另一方面，中国常常是在对外战略的总体布局中统筹处理对美关系的。而这其中，元首外交发挥了重要统筹引领作用，对于中美关系的总体走向和

[1] 刘连波：《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矛盾与纠结”》，中国网，2024年4月18日，http://news.china.com.cn/txt/2024-04/18/content_117133125.shtml。

止跌企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对外政策主张，如“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都主要面向全球宏观层面，其中对美关系是不可回避的关键环节。中国的对美政策并非孤立，而是中国整体对外布局的一环，最终要服务于中国的整体外交。例如，“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不仅为中国对外交往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战略纵深，也能够有力制衡美国试图以强权政治“将中国排挤出国际贸易体系”或逼迫其他国家与中国“脱钩断链”的行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中国与其他各国积极发展关系，这也能有效对冲美国对华遏制的负面影响。

四是包容性、开放性强。中方始终坚持中美合作共赢的理念，希望各国都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机遇。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1]；“中国从不赌美国输，从不干涉美国内政，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乐见一个自信开放、发展繁荣的美国”。^[2] 中国在美国碰到恐怖袭击、金融危机等困难的时候，没有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积极主张加强两国合作、共克时艰。对于美国在科技、经贸等领域无端、恶意对华实施打压和制裁的行为，中国并没有对美企业和产品实施“对等报复”和“极限打压”，而是坚持扩大对外开放，让外界进一步共享中国发展成果。

四、新时代发展对美关系的几点思考

2024年11月美国将迎来新一次大选，中美关系也将面临新的考验。

[1] 《习近平：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新华网，2023年11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3-11/16/c_1129977653.htm。

[2] 《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全文）》，人民网，2023年11月16日，<http://usa.people.com.cn/n1/2023/1116/c241376-40119847.html>。

随着2024年7月以来特朗普遭枪击、拜登被迫退选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接踵而来，以及特朗普和美国会参议员万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分别被确定为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美国大选已进入更加白热化和扑朔迷离的阶段。与此同时，尽管“中国问题”尚未成为美国大选的舆论焦点，但美国战略界对未来是通过继续管控中美竞争以求中长期“竞赢”还是通过强硬对抗的“新冷战”方式取得“速胜”存在激烈争执。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掌下一届美国政府，不管是“慢赢”还是“速胜”，美国都是要压倒或压垮中国。针对美国两党对华政策上的高度共识，中方不能抱有“美国未来一个时期会全面改善对华关系”的幻想，要有底线思维，并推促美国一道管控战略博弈的边界，即何种程度的“脱钩”以及多大程度的对抗，确保两国关系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迎头相撞，并尽可能地扩大合作面、促进共同利益的逐渐回归。总之，要处理好中美关系这一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并非易事，需要在党的对华方针政策指引下，从战略和实务层面综合施策、积极稳妥作为，管控好中美关系，稳中求进，并推动美方相向而行；同时，通过壮大自身实力、增强自身战略优势和深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布局，进一步提升新时代对美综合竞争和博弈能力。

（一）加强战略统筹，增强战略主动

一是从战略上高度重视美国对华战略的性质转变。从根本上看，美国恒久不变的目标是确保“霸权永续”，而制度霸权是确保其优势地位的关键途径，核心是通过规范、规则、制度、话语权和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来达到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若这一制度层面的影响力遭到严重削弱，美国在全球的话语权威性及国际信誉将遭受重创，进而导致其经济金融霸权乃至军事霸权显著受损。因此，美国难以接受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削弱乃至取代其制度霸权，势必将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视作对其制度霸权的挑战和颠覆，这也是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根本症结之所在。需要清醒地看到，美国可能会

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包括尝试建立各种围堵中国的“制度联盟”，以维护其在制度层面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其打压力度甚至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从对华战略取向看，美国当局和战略界已将中国定位为“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美国和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1]，并提出“无论中国对美国发展态势及中美关系走向的预判如何，美国都认为中国真正的对美政策是竞争乃至对抗”^[2]，因而“需要在必要的时候与中国对抗”。^[3]拜登政府还将对华竞争明确描述为“一代人只有一次的较量”，强调“美国正处在与中国竞争赢得 21 世纪的关键历史时刻”。^[4]从美国两党立场看，2019—2020 年第 116 届国会和 2021—2022 年第 117 届国会分别推出了 620 项和 860 项涉华议案，而第 118 届国会仅在 2023 年 1 年内的涉华提案就有 616 项，超过了第 116 届之前任何一届国会两年任期内的总数^[5]；美国会众议院下设相关委员会还创下 2023 年 2 月 28 日 1 天内连续通过 10 项反华亲台议案的纪录。^[6]可以预料，美国未来对华战略中的对抗性色彩仍将延续甚至走强。

从遏华动力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加剧是其加大对华遏制的主要动因，疫情、财政赤字、高通胀、工业空心化等问题给美国带来的破坏性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2*,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stream=top>.

[2] CSIS, “Ambassador Nicholas Burns 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July 25,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mbassador-nicholas-burns-us-china-relationship>.

[3] Antony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4]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8,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4/29/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address-to-a-joint-session-of-congress/>.

[5] Blaise Malley, “Congress and the 4 faces of China baiting bills in 2023,” Responsible Statecraft, December 27, 2023,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china-congress-2023/>.

[6] 石光：《美新一批反华法案的背景、影响及其应对》，载《经济日报》2023 年 8 月 14 日，第 3 版。

影响也将促使美国继续将中国视为“替罪羊”，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另一方面，美国自以为在实力上对华尚具有“优势”，仍将从“实力的地位”或者说“强权即真理”的思维出发打压中国，并继续打着“中国威胁”的幌子，全力动员盟友在国际上对华展开围堵，即所谓“难以直接改变中国的发展轨迹”（从中国内部和平演变不成功），那就“塑造中国周围的战略环境”（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美国竭力策动“脱钩断链”等事实表明，其即使是付出一定代价也要迟滞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虽然乌克兰危机、新一轮巴以冲突等一定程度上牵扯了美国的战略精力，但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华遏制的战略冲动，特别是特朗普如果再次上台，可能会力促俄乌停战，以“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因为他相信，调停俄乌冲突既有助于美国分化中俄关系，又有助于日俄关系改善和扫清美印关系中的俄罗斯障碍，从而大大增强日、印等国抗衡中国的动力和“底气”。

总之，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性质已发生转变，中美摩擦和矛盾的加剧难以避免，竞争和较量的方式将出现新的变化，中美博弈将呈现出愈发明显的复杂性、尖锐性、长期性和反复性，靠妥协或搁置分歧及单纯靠经济往来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经验已不再完全适用。因此，新时代发展中美关系的重点是要防止两国关系失控和发生冲突，原有的以合作共赢来促进中美关系的主线需要变为以合作与斗争、增信与制衡相结合来管控中美关系的综合思路。唯其如此，才能变美方驱动的中美恶性竞争、零和博弈对抗为中方力促的良性竞争与多维博弈，使中美关系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二是坚持管控好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2024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指出，中美关系要坚持几条大的原则。一要以和为贵，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不断提升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二要以稳为重，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三要以信为本，用行动兑现各自承诺，将“旧金山愿景”转为“实景”。^[1] 这为稳定与管控中美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据此，中方需要做到四个战略上的“保持”：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4年4月2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404/t20240402_11275431.shtml。

首先是保持战略自信，坚定走自我发展的道路。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说，中国自身的不断壮大，保持更强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将有助于中美关系趋于缓和。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赶上并超过美国，将令美国在遏制中国上无能为力；中国军事力量和国家凝聚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将使美国对中国的内政及周边局势难以干涉；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将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无计可施。另一方面，尽管美国面临内部挑战，但其经济体量巨大且社会具有较强韧性，轻易崩溃的可能性不太大。因此，中国从不会赌美国输，不会把自身发展壮大建立在美国衰落的基础上，也不会以取代或战胜美国为目标，而是立足于自我革新和完善；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并不追求全球霸权，而是寻求在一个多极的新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长远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1]以及更加有力的全球治理模式更加有利于大国关系的平衡稳定。

其次是保持战略定力，沉着应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强调，中美两国“关键是要有求同存异的远见和定力，不让分歧和差异主导或干扰两国关系”。^[2]中国既要不惧打压和关系紧张，也不能被美国的“竞争”话术和遏压做法打乱了阵脚，要保持主动性和自主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力避在中美关系演变进程中犯战略性或颠覆性的错误。中国还需要根据自身的目标和节奏进行战略规划和实施，并审慎应对美国的提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曾宣称，“在我们的利益需要时，美国与竞争对手对话甚至合作已有几十年的经验”。^[3]这表明美国

[1] 《王毅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内涵》，人民网，2024年3月7日，<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24/0307/c1002-40190923.html>。

[2] 《王毅出席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招待会》，外交部网站，2024年1月5日，https://www.mfa.gov.cn/wjzbzd/202401/t20240105_11219191.shtml。

[3]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and Q&A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January 30,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4/01/30/remarks-and-qa-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the-future-of-u-s-china-relations/>.

始终根据本国利益推进对华战略，中国也需要依据国家利益提出或回应美方的各种“合作”要求，在自主前提下与其协调推进合作议程，避免为了稳定中美关系而盲目顺从美国的战略布局。此外，还需要将解决台湾等重大敏感问题置于中美博弈的框架下来加以运筹。如果中国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具有更强大的战略竞争力，将会使美国在这些问题上难以掀起风浪。

第三是保持战略清醒，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应放弃对未来中美关系过度乐观的期待，做好最坏打算，着力做好危机管控，并因时应势善谋“化危为机”之策，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在关键领域逐步降低对美依存度，时刻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领域的对华摊牌局面。

最后是保持战略沟通，防止误判和冲突。近年来，虽然美方中断了奥巴马政府期间与中国建立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但两国在战略层级的沟通对话持续不断，主要包括元首会晤通话、各类高层级官方沟通会谈和“二轨”对话交流等，对于相互增信释疑、管控分歧矛盾、避免战略误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未来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有增加的趋势，双方需要本着开放、坦诚、务实的态度，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特别是增强沟通实效。

三是积极发掘战略上主动作为的空间。王毅指出，共赢是中美交往最本质的特征。^[1]过去的几十年，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经济合作促中美全方位关系稳定与发展的总体思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未来美国基于维护霸权的利己思维，将很难接受中国的互利共赢理念。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目标立足于中长期甚至“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不战而胜”，同时尽可能减少美国的成本付出。为此，美国势必会拉上盟友一起来对付中国，分担美国单独应对中国的风险和成本代价，其逼压和拉拢盟友的话术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此，中国也应避免过度夸大美国的实力及其表现出的“强势”。尽管美国表面上故作“坚决”“自信”的姿态，但在东西

[1]《王毅出席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招待会》，外交部网站，2024年1月5日，https://www.mfa.gov.cn/wjzbzd/202401/t20240105_11219191.shtml。

方力量对比逐渐缩小的背景下，其也在谨慎控制对外政策的成本，不太可能采取不计后果的全面对抗。事实上，美国当前的对华示强表现也是为掩盖其内部的问题和不安，不乏“虚张声势”的成分。美国过去不需强调其不败的立场，因为其认为“自己不可能输”，但当前美国面临失去其霸权地位的可能性在增加，美国的焦虑及其许多“吹口哨壮胆”式的表现正在成为其战略规划的一部分。

从近年“躺平抗疫”、债务剧增、高通胀持续、“再工业化”步履维艰等问题特别是美国党争、内斗愈演愈烈等乱象中可以看出，即使美国在服务业、创新等领域显得有一定“活力”，但其制度和结构性劣势愈发明显，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因此，还应当关注其脆弱性和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随着美国国力变化、政权更迭和经济社会动荡，美国的中长期内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竞争力不断增强，美国对华早已不具备全方位优势，中美在一些领域的利益角逐更多表现为“缠斗”，彼此你中有我，双方优势会交替出现，也可能会保持力量均衡。因此，虽然中国面对美国的战略窗口正在缩减，但机会并未完全消失，中国需要准确评估美国的战略弱点和合作需求，调整自身策略，以应对美国的内部变化并寻找合作与竞争的平衡点。正如中方所反复强调的，当前形势下，中美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中美合作的必要性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强了。^[1]这要求中国在全球战略布局中，持续强化自身的多维竞争力和合作潜力，确保在动态变化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主动。同时，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主动性不仅体现在促进务实合作与界定竞争的边界上，更体现在通过多维度的战略布局来优化运筹中美关系上。

四是进一步具象化对美方针政策。美国历届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及中国的部分、美国国务院和国会等部门的涉华政策报告显示，美

[1] 《王毅出席纪念中美建交 45 周年招待会》，外交部网站，2024 年 1 月 5 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401/t20240105_11219191.shtml。

国的对华战略貌似较为具体且更具有针对性；而中国的对外战略则更多集中于全球层面，对具体国家的针对性和指向性并不突出，中国的对美政策方针也通常嵌在整体的国际战略之中，往往是原则性的指引。这会给美国猜疑乃至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刻意曲解、抹黑中国的真实意图留下一定的空间。例如，中国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却被美方曲解为“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中国将“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视为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利益和发展，而美国则臆测“这是企图诱使美国接受其在双方分歧领域的主张”，诬称“这背后隐藏着中国的扩张主义行为”，甚至将中国提出的“双赢”歪曲为“中国赢两次”。中美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美方的故意曲解，但有时也是由于概念的抽象以及我们对外传播进行政策解读的跟进不够及时。因此，中国可以进一步明确、系统地阐释对美政策，将中方对中美关系面临的现实环境、利害是非、态势状况、未来趋向及对双方国际作用与地位的评估进一步具体化，将中方相关政策立场、目标、实施举措以及红线底线进一步细化实化，力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增信释疑、促进良性互动的效果，从战略上增强塑造中美关系的主动性能动性。

五是大力提升战略制衡能力。要赢得对手的尊重，防止对手滥用实力，还必须拥有强有力的战略制衡手段。这包括：1. 制度性和多边框架内的制衡。中国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大力倡导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积极推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有利的全球治理政策规则，促进全球均衡发展，提升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形成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有效的战略抗衡力量。2. 技术领域的战略制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已经在5G等技术的推广和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还可在数字经济、新能源和人工智能应用等更多更新技术标准的制定方面积极发挥先导作用，确保在全球技术治理中占据前沿地位，增强中国技术的国际竞争力。3. 战略威慑的制衡。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是中国在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下，站在全局性、长远性角度作出的重要判断。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必须要保持强大的战略威慑和制衡能力，包括加强传统的核威慑力量建设发展，加快新域新质的常规战略威慑力量构建等。

（二）综合施策，积极稳妥作为

在指导思想，中方应遵循上述习主席有关发展中美关系的三条原则，继续敦促美方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加强对话，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以互惠的精神推进合作，以负责的担当加强国际协调。同时，坚决反对美方恶意侵害中国主权、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恣意剥夺中国正当发展权利的企图和行为。

在政策实施层面，首先是注重对元首外交及其他高级别双边沟通对话机制的综合运用。直接的高层沟通对处理政治、安全、科技等敏感议题尤为关键，有助于避免误解和误判；加强危机管理与战略沟通，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沟通，有效管理和解决可能的冲突和危机，是双方避免战略误判的重要措施。其次是深化中美务实合作，加强在经贸、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文、执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与美方开展军事交流，做多做大互利成果，并为两国在更广泛的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建立信任与合作的基础。第三是进一步探索和明确两国竞争与合作的界限。这对避免全面对抗至关重要，既需要通过外交和国际法理等途径来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又需要寻求双方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处理方案。

在具体事务操作层面，也要调整思路，变被动反应为主动布局。首先是处理好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会放弃“以台制华”策略，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地助台挺“独”。中方必须坚决反击美方继续“切香肠”等伎俩，更加积极主动地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对美方阐明红线底线，保持对“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压态势，持续加强军事斗争准备。

其次是增强抵御美国干扰破坏中国外部环境和破解美国围堵的能力。中国可在不断深化与各国双边合作的同时，积极利用联合国、G20等国际

多边场合、中国与东南亚、中亚、南亚、中东、非洲、拉美、南太平洋、中东欧等地区之间的多边对话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等平台,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纽带,加强同各国的联系,巩固和扩大“朋友圈”。同时,切实增强对内对外政策的相互适应性,通过国内政策的微调来回应国际关切,进一步提升国际形象。另外,通过加强与美国的盟友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深度利益交融的周边国家以及在贸易、气候变化等方面与美方持不同意见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打造合作共赢样板,牵制和破解美国推行的“联盟围堵”“小多边围堵”战略。

最后是在关键领域主动谋局布势。当前美国对华打压已逐渐扩展至所谓的“新五战”领域,包括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网络战和舆论战。针对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动作和企图,中国需要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下好先手棋,以己变应万变。首先,在经贸金融领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关键策略,通过增加人民币在国际交易和金融储备中的比例,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积极推动数字货币的应用,尽可能降低美国可能发动金融战的影响;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抢占产业变革制高点,扩大内生动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同时对美方区别对待、收放有度,既要让更多美国企业感受“融进”之利,更要让其认清“脱钩”之害。其次,在科技领域,要着力健全完善科技体制,进一步激发国内创新动能,发展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以减少在科技战中的脆弱性。第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加强对国内网络基础设施的保护,提升对外部攻击的防御能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和相关规范准则的制定,以争取话语权。第四,在舆论方面,应通过构建更为开放和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传播力,有效增强对外传播效能,有力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污名化叙事。另外,在军事安全领域,中方也需要在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加强中美军事交流和危机管控机制建设,累积互信基础,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

合理增加军事透明度，适度回应国际社会顾虑；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和法律途径解决有关争议争端，管控危机事态，防止军事冲突。

（三）提升舆论塑造能力，在人心向背上多下功夫

在全球层面，要进一步展现中国包容、开放、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倡导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思想，又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旨在塑造一个更加均衡和共赢的全球治理环境。这些倡议和理念不仅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发展的新机遇，也表明中国不是全球化的唯一受益者，而是推动全球利益共享的关键行动者和引领者，因而广受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的欢迎。甚至有美国学者承认中国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方案确实能得到各国的认同，建议美国政府也将自身定位为推动国际制度变革的力量。^[1]在此背景下，美国近些年来的战略收缩不仅未能有效减轻对其自身的国际压力，反而使得其对外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式的伪多边主义倾向更加凸显，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中国应在继续推进各种全球治理倡议的同时，一如既往地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参与并加强相互合作，因为这种合作不仅有利于全世界，也有助于缓解相互关系中的紧张或不睦氛围。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欢迎美国企业更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大型经贸活动，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赢在中国。^[2]中国应该积极参与解决国际冲突和危机，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参与中东、欧洲等地区安全架构的设计，增强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此外，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需要更多地展现开放、友好、亲诚姿态，在有力反驳反华势力抹黑构陷中国的同时，力避营造排外、仇外或敌视外国的舆论氛围，并积极欢迎更

[1] Elizabeth Economy, "China's Alternative Order," *Foreign Affairs*, April 23,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chinas-alternative-order-xi-jinping-elizabeth-economy>.

[2] 《关于中美关系、中国经济，习近平主席最新论述》，新华网，2024年3月27日，<http://www.news.cn/world/20240327/7b549d57c7554f76a8273d725ff5a4e9/c.html>。

多外国人近距离接触感受真实的中国，增强对外亲和力与吸引力。

在双边层面，要做深做透美国民众的工作，厚积友华力量。习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拉紧人民的纽带、增进人心的沟通，越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中美关系鼓与呼。我们要为人民之间的交往搭建更多桥梁、铺设更多道路，而不是设置各种障碍、制造“寒蝉效应”。^[1]既然美国政客、战略精英可以通过散布反华仇华叙事自上而下毒化中美关系的气氛，中国同样可以通过蓄积美国各界理性呼声和民众友华动能自下而上影响美国当权者的对华态度和政策。为此，中国可以通过多渠道和多层次的交流促进与美国民众的直接联系，尤其是那些美国政策制定者较少关注的州和县市；通过青少年交流、教育合作、经济伙伴关系、科技创新合作等方式，努力多创实实在在成果，逐步构建起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理解的民间友好关系框架。此外，中国需要通过美国媒体和各种公共外交活动，积极展示中方致力于和平发展、寻求中美互利共赢的意愿和实际行动，进一步增进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正面积极看法。

（四）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客观全面了解美国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中方相关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需要总结过往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升涉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增强研究的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要一分为二辩证地看美国。要全面客观评估其实力现状，既要看到其占优强势的一面，也要看到其虚弱露怯的一面；既要看到其突出竞争遏制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寻求共存的一面；既要看到其力不从心而寻求合作的一面，更要看到其竭力挣扎而不择手段捣乱的一面。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要看到美国企业在对华科技脱钩中表面上的损失，也要看到这种短期成本实质上对美国是可接受的；既要看到美国在其拼凑的遏华联盟体系中的“号召力”，也要看到其越依赖盟友的跟随配合，其领

[1] 《习近平：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新华网，2023年11月1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1/16/c_1129978349.htm。

导地位实质上也就越弱。三要克服以偏概全倾向和惯性思维。要从美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动态变化中把握美国政治生态的变迁趋势，而不是以管窥天，把少数美国精英的观点当作主流观点；要对美国政治人物进行全谱化分析，避免片面化、简单化刻像；既要从“正常国家”框架探究美国的行为逻辑，也不能忽视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所特有的战略思维模式及其宗教立国、移民兴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四要多管齐下，群策群力。要官民并举，中央和地方、实务界和学界、传媒界、商界齐出，多方了解情况；要广泛发掘网络、媒体等开源信息资源，多渠道搜集资料；要通过文献、研讨、座谈等各种形式加强交流互鉴，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尤其要在合理合法前提下多重视与美国各界人士交流，多深入实地调查，多掌握一手资料，即使面对美方对中美人员交往的种种限制，也要迎难而上、持之以恒。

【 来稿日期：2024-04-15 】

【 修回日期：2024-08-21 】

（责任编辑：王霄巍）